

传统文化普及读本

孟子

□ 乌恩溥／注译

《孟子》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著作，儒家经书，国学经典之一。

本书是中国哲学史家乌恩溥先生，在长期研究儒家思想和准确把握《孟子》精髓的基础上，花数十年心血撰写而成。采用通行版本，注释详尽明晰，翻译准确达意，点评中心突出，言简意赅，深入浅出。既有相当的学术价值，又有很强的可读性，是一部很好

長 春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传
统
文
化
普
及
读
本

孟子

乌恩溥 / 注译

长 春 出 版 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子/乌恩溥注释. —— 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2011. 6

(传统文化普及读本)

ISBN 978-7-5445-1748-5

I. ①孟... II. ①乌... III. ①儒家②孟子—注释③孟子—译文
IV. ①B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0133 号

孟子

注 译: 乌恩溥

责任编辑: 张中良

封面设计: 刘喜岩

出版发行: **长春出版社** 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: 0431-88561177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www.cccbs.net

制 版: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

印 刷: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92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定 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印厂电话: 0431-84917482

前 言

吾师乌恩溥先生的《四书译注》初版于1989年。该书出版后，在社会上产生较好的反响，于学习、传播和普及儒学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。此次长春出版社再版此书，形式上有所调整，最主要的是将原书一分为二，成《名家讲解〈论语〉》（附《大学讲解》、《中庸讲解》）、《名家讲解〈孟子〉》二书分别出版。乌先生年事已高，视力欠佳，故责任编辑张中良先生嘱我就《孟子》及有关情况略作说明，我感到义不容辞。

关于《孟子》一书的作者，历来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：第一种意见，认为《孟子》是孟子本人的著述，东汉赵岐、宋代朱熹、清代阎若璩等持此看法；第二种意见，认为《孟子》是孟子死后，其学生万章、公孙丑对孟子言行的追述，唐代韩愈和张籍、宋代苏辙和晁公武、清代崔述等持此看法；第三种意见，认为《孟子》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共同的著述，而孟子自己是主要作者，太史公司马迁持此看法。笔者认为，司马迁的看法较为可信。

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一样，《孟子》一书亦以人名为书名。这一点与《论语》不同。《孟子》全书共七篇，即《梁惠王》（上、下）、《公孙丑》（上、下）、《滕文公》（上、下）、《离娄》（上、

下)、《万章》(上、下)、《告子》(上、下)、《尽心》(上、下)。每篇皆截取篇头数字为篇名,并无特别的意义,这一点与《论语》是一样的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,《孟子》一书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。只是到了南宋,理学家朱熹将其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合称四书,从而确立了《孟子》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。代表性的注本有:东汉赵岐的《孟子注》,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,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和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等,今人杨伯峻的《孟子译注》也颇有影响。

关于《孟子》所反映的孟子及其儒学的思想内容,乌先生在《儒家〈四书〉》(原《四书译注》前言)中就四书合而论之,从天命论、人性论、认识论、道德论、政治论、教育论、道统论等七个方面展开论述,其中每一项都论及《孟子》。本书已将此收录进来,此不赘述。笔者想指出的是,解读《孟子》,务须留意孔孟之间的承传和发展的关系。就是说,要想读懂《孟子》,首先要读懂《论语》,只有这样,才能理解和把握孔孟之间的一脉相承及孟子对儒学的发展和贡献。历史上孔孟并称,他们的学说被尊为孔孟之道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是其一。其二,解读《孟子》,务须对孟子的个性风格给予特别的注意。在先秦诸子中,有两位奇人怪人,一位是道家的庄子,一位是儒家的孟子。他们两位的特点,一方面极有才华,另一方面极有个性。就孟子而言,他是一位具有“大丈夫”气质的学者,一位无畏的斗士。他所以能够提出“民贵君轻”的观念,所以能够藐视君权的神圣,他的叙述方式以驳论为主,都与他的这种气质与个性紧密相关。其三,孟子提出“知人论世”,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念。我们解读《孟子》,也要做到“知人论世”。要认识孟子所处的时代,认识当时各家各派的基本主张和学说主旨,只有这样,才能理解和把握孟子思想的时代性和超时代性,才能理解和把握孟子

对其他家派的批评哪些是允当而有见地的，哪些是欠公允而武断的。总之，《孟子》被视为仅次于《论语》的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，孟子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“亚圣”，并非没有根由。

《传统文化普及读本：孟子》主要由《孟子》原文、译文、注释及讲解四部分构成。乌先生的译文准确、晓畅，注释详尽、清晰，讲解中心突出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。这是一部既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，又具有较好的可读性的儒学入门读物。

本书与《四书译注》的不同，除了将《孟子》部分单独成书外，还有：（1）变原文、注释、译文顺序排版为原文、译文对照排版，注释紧随其后，将原来的题解改为点评放在各章的最后，从而更便于阅读；（2）变单色排版为双色排版，从而提升了视觉效果；（3）编辑参照杨伯峻的《孟子译注》等，就译文中的意译部分作了少许改动。以上诸项有必要在此向读者朋友作出特别的交代说明。

邵汉明

2010年11月30日

儒家《四书》

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我国历史上，从南宋时期起被编辑在一起，称为“四书”，作为儒家的“经书”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原来分别是《小戴礼记》书中的一章，在南宋以前没有单独地刊行过。早在唐代，韩愈、李翱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，十分推崇这两篇文章，把它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提并论；到了宋代，程颢、程颐更是竭力推崇这两篇文章。关于《大学》，他们说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《论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”关于《中庸》，他们说：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。“其书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为一理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，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。”二程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推崇到了极点。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，也竭力推崇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。他说：《大学》是“为学纲目”，“修身治人的规模”；“先通《大学》，立定纲领，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。通得《大学》了，去看他经，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，此是正心诚意事，此是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事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）关于《中庸》，朱熹用伪古人尚书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十六字诀来阐发《中庸》的“传授心法”。他认为《中庸》所谓的“天命”、“率性”，就

是指的“道心”；所谓“择善固执”，就是指的“精”、“一”；所谓“君子时中”，就是指的“执中”。因此，可以说《中庸》是“提絜纲维，开示蕴奥”，是“前圣之书”所不及的。朱熹要求学习的人要“得于辞而通其意”，把“孔门传授心法”，“诵习而传心焉”。在二程和朱熹看来，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，一个是“初学入德之门”，一个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，都具有很高的意义和价值。所以从《小戴礼记》一书中提取出来，作为单行本刊印，并且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列在一起称为“四书”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在宋代以前，人们是把它当做“子书”看待的，并没有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。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，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，在当时的思想界，关于孟子的地位问题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论争。以李觏、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激烈地排孟、抑孟。李觏说：“孙吴之智，苏张之诈，孟子之仁义，其原不同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。”（《常语》）司马光说：孟子是“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。此外，还有郑厚叔、冯休等人都极力批评孟子，贬低孟子。相反地，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则极力地尊孟、扬孟。二程说：“孟子大有功于世。”“孟子有功于圣门，不可胜言。”朱熹说：“《六经》如千斛之舟，而孟子是运舟之人。”从朱熹写了《读余隐之尊孟辩》这篇文章以后，尊孟和抑孟的论争就逐渐地偃旗息鼓了。孟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确定下来了。《孟子》作为儒家的“经书”的地位也就成为定论了。

南宋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朱熹在福建漳州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汇集到一起，作为一套“经书”刊刻问世。人们把这套“经书”，简称做“四书”，从此“四书”这一名称就广泛地流行起来。不过，朱熹编定的“四书”的次序和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次序是不同的。朱熹说：“某要人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。

次读《论语》以定其根本。次读《孟子》，以观其发越。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处。”《四书》的最初刻本，就是按照朱熹说的这个次序安排的。后世由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幅较短，考虑到装订上的方便遂把两者合并到一起，逐渐地形成了现在通行的次序。

《四书》问世以后，就和《五经》并列起来，通称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那么，《四书》和《五经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综观二程、朱熹的言论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从两套“经书”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来看，有广、狭的分别。《四书》所包括的内容，主要是孔子、子思、孟子的著作，是儒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，范围比较狭窄，但是，和儒家学派的关系是直接的。《五经》包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都是孔子以前的所谓“古圣先贤”的“先王之教”，范围比较宽泛，和儒家学派的关系比较间接。第二，从两套“经书”的大小、远近、难易的程度来看，《四书》的量少，《五经》的量多；从时代上看，《四书》距离比较近，《五经》距离比较远；从阅读的难易程度来看，《四书》易，《五经》难。两套“经书”在这几方面是有明显的差别的。第三，从两套“经书”在教育中所处的地位来看，《四书》是初级阶段的必读教材；《五经》是较高阶段的必读教材，两者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。朱熹说：“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，未须理会《经》，先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专意看他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零四）作为一种进学的程序，先读《四书》，后读《五经》，这是由初级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的过程。因此可以说，《四书》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初级教育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朱熹编定《四书》的目的，除了前面提到的，确立《四书》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初级教育中的地位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对《四书》的注释，建立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，确立程朱理学

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。朱熹在编定和刊刻《四书》以后，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，七易其稿，写就了《四书集注》。朱熹注释《四书》的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抛开了汉儒重视训诂的注经传统，把义理的阐述和发挥放到了首要的地位。特别是突出地用二程和他的门弟子的思想、言论来阐释和发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内容，使得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的著作披上了理学的外衣，成了程朱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朱熹通过《四书集注》构筑起来的理学的理论体系，包括以“天理论”、“性论”为内容的宇宙观；以“格物致知论”为内容的认识论；以“政治论”、“教育论”为内容的社会政治哲学；以“道统论”为内容的儒家道统说。这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。

上述一些事实，就是《四书》产生的历史背景。今天，在我们阅读《四书》的时候，应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。

首先，关于《四书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。《四书》从它问世时期起，到现在已经将近八百年了。在这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《四书》作为庠、序，即地方学校的基础教材而广泛地使用着。这部书既是一部文化课本，同时又是一部政治课本或道德伦理课本。作为文化课本，封建统治阶级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学习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；作为政治课本或伦理道德课本，封建统治阶级力图通过这部书的学习，培养人们的忠孝思想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。应该看到，封建统治阶级利用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对人民群众进行封建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做得很“成功”的。中国封建社会所以延续这样长的时间，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的封建的政治思想教育取得了巨大的“成功”是分不开的。《四书》作为一部儒家的“经书”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此广泛而深刻

的影响，起到过很大的作用，是值得进行深刻的探讨和研究的。另外，这部书作为儒家的“经书”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，它具有时间近、范围小、易读，以及和儒家的关系是直接的等特点，在今天看来，仍然不失为研究儒家思想的基本材料。因此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，《四书》都有它值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。

其次，关于《四书》的思想内容。《四书》作为儒家学派的“经书”，它反映了儒家思想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晚期的发展和演变。儒家学说创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。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。孔子死后，儒家学派发生了分化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说：“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氏之儒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孟氏之儒”，指的是孟轲；“孙氏之儒”指的是荀况。儒家八派里，以孟、荀两派的影响最大。《四书》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，就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由孔子经过曾子、子思，到孟子的发展、演变历程。下面从天命论、人性论、认识论、道德论、政治论、教育论、道统论等七个方面分别加以叙述。

关于天命论。对于“天”，在孔子看来，它具有两重性。一方面，“天”具有自然的属性，他说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（《阳货》）一方面，“天”又是有人格的，有意志的主宰，他说：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（《八佾》）由此可见，孔子自己是相信天命。但是，孔子并不是消极地等待“天命”的安排，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努力。孔子的“自然之天”的思想由荀况加以继承和发展，形成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；而孔子的“意志之天”的思想则被子思、孟子所继承，发展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“天命观”。相传子思所作的《中庸》，提出了“诚”这一哲学范畴，并认为“诚”是宇宙万物的本原。《中庸》认为，宇宙间一切事物，都是由“诚”派

生出来的。“诚”是天的根本特征。人通过“思诚”、“至诚”、“诚之”的途径，就能够达到“天之道”的“诚”，就能够和“天道”合一，达到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。一方面，他极力倡导“意志之天”，把它推崇到至高无上境界。在他看来，“天”虽不能违背民意，但是天的意志始终是至高无上的，是主宰并决定一切的。另一方面，孟子认为，只要能够“反身而诚”，就能够“尽心”、“知性”；能够“尽心”、“知性”，就能够“知天”。

综上所述，儒家学派的天道观，由孔子经过曾子、子思，到孟子，是沿着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发展的。如果说在孔子那里，“天”还具有两重性的话，那么，经过曾子、子思，发展到了孟子，“天”就是主宰一切的人格神了。《四书》所反映的儒家学派的天道观，是唯心主义的天道观。这种唯心主义的天道观，和朱熹在《四书集注》里所宣扬的以“天理论”为内容的宇宙观，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联系，两者是一脉相通的；同时，两者又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。

关于人性论。孔子很少谈论人性的问题，《论语·公冶长》记载：“子贡曰：‘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’”《论语》里记述孔子谈论人性的只有一句话，即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后来，子思在《中庸》中对儒家人性论思想，有了很大的发展。《中庸》开宗明义地宣称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也就是说，“性”是上天的禀赋，一切事物的秉性都是上天赐给的。而这种上天赐给的秉性，体现在宇宙万物身上就是“诚”。因此，就人或宇宙万物来说，做到“至诚”，就是做到“尽性”或“知性”了。《中庸》以“诚”为基础的哲学，赋予了宇宙万物以道德的属性，为孟子的性善论开辟了道路。

孟子继承“诚”的哲学思想，把“诚”的哲学中关于人性问题的主张，发展成为“性善论”学说。他认为，“人无有不善”，“人性

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”。每个人都有“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恭敬之心”和“是非之心”。而且所有这些，都是“不学而能”、“不虑而知”的天赋的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。正是由于有了这种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，因此，仁、义、礼、智等道德意识是与生俱来、先天固有的。虽然如此，外部环境对于人们的道德意识并不是没有影响的。孟子认为，由于外部的条件不同，人们的行为才有了不同的表现，为了克服外物对先验的道德意识的遮蔽和妨害，孟子提出了“求放心”的主张。如果克服掉不善的欲念，保养好先天的仁、义、礼、智等道德意识，使之发扬光大起来，就可以成就高尚的道德境界，直至成为“圣人”、“贤人”。达到这种境界以后，内心的善和外现的仪表、风度，就会表里如一，动容中止，完全合乎仁义。

以上可以看出，在人性论问题上，儒家学派的观点是有很大发展的。如果说人性问题在孔子那里，还仅仅是萌芽，那么，子思用“诚”的宇宙本体来阐释人性，就为“性善说”开辟了道路，到了孟子那里就形成了完整的性善说。思孟学派倡导的“性善说”，是和他们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相表里的，是以他们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为基础的。这是《四书》所反映的孔子、孟子关于人性问题的观点。至于朱熹通过《四书集注》所倡导的“天命之性”、“气质之性”、“天理”、“人欲”等主张，应该说是程朱学派的观点，这些观点和思孟学派的观点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，但是，又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

关于认识论。孔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。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（《阳货》）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（《雍也》）虽然他提出“生而知之”的观点，具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因素，但是，他指出人的天资、智力是具有差别的。有的人人生来就是聪明、智慧的；有的人人生来就是愚昧的。这种天资上的差

别是不可改变的。由于在天资、智力上有上、中、下的差别，所以在因材施教上也是应该有所不同的。这种见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其次，在认识方法上，孔子坚持采取求实的态度。认识事物要从多方面入手，对于各种不同的见解，要有鉴别，有选择；同时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。孔子还强调认识事物切忌主观性、片面性和表面性。反对主观臆断，固执己见。相传曾子所作的《大学》，也提出了“格物致知”的认识论观点。所谓“格物”，就是探讨、研究各种事物；所谓“致知”，就是达到对于事物的了解和认识。格物、致知的目的在诚意、正心。能够做到诚意、正心，就是做到了“知本”，即做到了认识的最高要求。这样就能通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达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《中庸》进一步发展了《大学》的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的思想，提出了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圣人”生来就具有“诚”的天性，生来就是“诚”的化身。“圣人”生来就是在天地境界的，生来就是和“天地参”的。因此，“圣人”是不须经过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的途径来提高道德修养的。“自明诚，谓之教”，必须经过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的过程，发扬自身的“诚”的本性，努力学习，加强自身的修养，才能够造就高尚的道德情操，达到“诚”的境界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“生知”、“学知”、“困知”、“下学上达”的思想。

孟子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基础上，把儒家的认识论学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。他提出了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则知天矣”（《尽心上》）的命题。他认为，心的职能在于思维，思维是心所特有的一种能力。这种思维能力是上天赐给人类的。人们有了这种思维能力，就应该运用这种思维能力把内心固有的“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培植起来，扩充起来，使之

形成为仁、义、礼、智的道德观念。同时，让这种仁、义、礼、智的道德观念成为自身的主宰，支配自己的行动。这就叫做“立其大体”，这也就是“尽心”。只有“尽心”才能够“知性”。一方面“尽心”，一方面“知性”，通过“尽心”、“知性”的反复践履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，最终达到尧舜的高度，这样就可以和“天地参”，成为“贤人”、“圣人”，这就叫做“知天”、“尽心”。“知性”、“知天”作为一条认识路线，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。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孔子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认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，是孔子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

总起来说，在认识论领域里，儒家的学说从孔子的“生知”、“学知”、“困知”和“下学上达”的思想，发展到《大学》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，发展到《中庸》的“自诚明”、“自明诚”，再发展到孟子的“尽心”、“知性”、“知天”，始终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发展的。虽然其中有许多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精辟见解，但是从根本上说，依然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。这点和朱熹通过《四书集注》倡导的“格物致知论”在本质上是—致的，两者是一脉相承的。不过，朱熹提出的“即物穷理”、“致吾之知”、“一旦豁然贯通”等命题，是二程、朱熹对于孔、孟的认识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，这些命题和孔、孟自身的命题是有区别的。

关于道德论。孔子倡导以礼为形式，以仁为内容的伦理道德学说。孔子认为道德无论就个人来说，还是就国家来说，都是必要的。就个人来说，高尚的道德修养是立身处世的基础；就社会、国家来说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高尚的道德修养，国家也就得到治理了。道德是立国的根本。孔子的道德学说以仁、礼、中庸为核心内容的。所谓“仁”，它的含义就是“爱人”。所谓“礼”，它的本质含义就是明尊卑，别贵贱，就是在封建等级制的基础上使人与人之间的

关系规范化起来。所谓“中庸”，就是“允执其中”，既反对过，又反对不及。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在孔子的伦理思想里，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统一体，是不可分割的。此外，孔子还提出了孝、悌、忠、恕、信、义、智、勇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等许多伦理道德范畴。这些都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探讨、研究这些伦理道德范畴及其有关的思想，对于了解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《中庸》一书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“中庸”的思想。《中庸》一书赋予“中庸”以双重的含义。首先，它赋予“中庸”以内心的道德修养的含义。其次，是方法论的含义。这就是说，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，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，既反对过头，又反对不及。这种方法论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，在儒家学派看来，也是一种美德。因此，《中庸》十分强调要重视并且培养“中庸”这种德行，能够造就成“中庸”这种美德，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

孟子继孔子、子思之后，进一步地倡导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的学说，同时，又把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的学说和心性学说结合起来，用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的思想来充实心性学说的内容，用心性学说来发扬“仁”、“礼”的精神，从而使两者结成一个整体。修养心性，从消极方面说，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。一个人的私欲越多，存养的“仁”、“义”就越少。相反地，私欲越少，存养的“仁”、“义”就越多。减少私欲，有利于仁、义观念的增长；仁、义观念的增长又促进私欲的减少，两者是相互促进的。为了减少私欲以促进仁、义观念的增长，孟子主张要不断地“反求诸己”。行仁的结果出了毛病和偏差，不要埋怨别人，要反过来问一问自己，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。孟子还强调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。他认为，心志是第一性的，是起主导作用的；气是第二性的，是从属的。气虽然充满在体内，但是，必须在心志的统率和支配之下才能起作用。

就心志和气的关系来说，心志专一能够左右气；气专一也能影响、作用于心志，两者是相互作用、相互促进的。从这样一种“志”、“气”关系的立脚点出发，孟子认为：用仁、义来充实“心”、“志”，让以“仁”、“义”为主体的“心”、“志”来统率气，就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“浩然之气”。它充塞在天地之间，具有无穷的力量。孟子十分重视由于道德修养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和作用。

总起来说，在道德论的领域里，儒家学派是以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为核心建立起他们的理论体系的。不过，这中间也有继承和发展。譬如，关于“中庸”，孔子只讲了一句话，到了子思就赋予“中庸”以心性修养和方法论的双重含义。再如，关于“仁”、“礼”，在孔子做了深刻的论述的基础上，孟子又用心性学说做了进一步地阐释和发挥。这样就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更加完善起来了。至于朱熹通过《四书集注》宣扬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等主张，那是二程和朱熹对于孔孟道德学说的继承和发展，不能把这些命题和孔孟的命题混为一谈。

关于政治论。孔子倡导仁政，主张德治。他认为，人口发达，生活富裕，广施教化，是仁政德治的标志。

对于执掌权力的统治阶级来说，孔子倡导“正名”和“克己复礼”。这样封建的等级秩序就能够得到维护了。“正名”和“克己复礼”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；孔子倡导“正名”和“克己复礼”的根本目的，在于忠君尊王，在于维护封建的等级秩序。从这点出发，孔子极力反对政治上的僭越行为。他抨击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，“旅于泰山”；抨击管仲“树塞门”、“有反坫”等等，都是主张“正名”和“克己复礼”的表现。

《大学》倡导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这一主张和《礼记·礼运》倡导的“大同”思想是一致的。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继